

從《高考1977》說起

• 蕭 慧

2009年，時值改革開放三十一周年，恢復高考三十二周年。文化圈裏掀起了「八十年代熱」，討論反思改革，重返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歷史場景的理論著作和文學影視作品頗多。《高考1977》便是這股浪潮中的一個頗有意味的歷史性文本，以其豐富的故事性和視覺性傳達出對1977年這一歷史轉折點的更為大眾化的表達和理解。有學者曾指出，「『恢復高考』標誌着『舊時代』的終結和『新時期』的開端。」^①影片導演江海洋和投資人熊曉鴿都是這個歷史性的「終結」和「開端」的親歷者，經由恢復了的高考制度改變了命運，進入了精英階層。影片的一些情節就是根據他們的親身經歷設計的，這也賦予了影片的歷史性敘事些許個人回憶和情感的色彩。

影片的情節並不複雜，敘事手法和鏡頭語言也比較單一直白，基本延續的是悲喜劇(melodrama)的煽情傳統，講述的是在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以後，黑龍江省前進農場三分場裏的一群上海知青(雖然演員大都有北京口音)努力爭取參加考試以改變個人命運，最終考上大學回到城市的故事。這其中又穿插了男主角潘志友(王學兵飾)和女主角陳瓊(周顯欣飾)

的愛情故事以及陳瓊和陳甫德(趙有亮飾)的父女之情兩條線索。整部影片可謂接續了「傷痕文學」和「知青文學」的傳統，符合新時期以來的主流敘事。片頭的黑白照片展示出一系列辨識度極高的歷史場景：大字報、上山下鄉、標語和口號。片尾的一系列數字更是將歷史的巨大轉折加以量化，以客觀的科學數據展示着知識的權威性。

貫穿整部影片的滾滾列車反覆以慢鏡頭大特寫出現。這以風馳電掣的速度呼嘯而過的鋼鐵巨獸既是知青們下鄉和回城的交通工具，也隱喻着工業文明模式的現代化進程。它高速、冷酷而準確，一天一趟，不為任何人停留，趕火車去縣城參加高考的知青們只有身強體壯衝在最前面的(大多是男性)才有希望。正如導演江海洋所說，這永遠向前的火車暗示了現代社會裏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他坦言，在創作這部電影時，知青們追火車去考場的一段最讓他感動，而這段戲的設置也別有用心：「那一段就是象徵我們那個時代，高考一來，等於發令槍一打，誰都可以參加，大家都往前跑，跑在前面的人就改變了命運。我覺得人生就像趕這輛火車一樣。」^②



《高考1977》劇照

這樣一部主旋律影片在北京大學百年講堂首映後，不僅獲得了不錯的票房和口碑，也得到了不少年輕一代網友的共鳴。在以小資扎堆而出名的「豆瓣網」上，一位名叫“sugar”的網友寫道：「今天老師課上放了給我們看，我想我自己是不會看這種主旋律電影的，因為看了會不開心，但是不否認感觸很大，沒想到現在我們怨聲載道的高考，當初人們是如此的渴望！！經歷了高考，雖然它沒有以前說會影響一個人的一生，但是它真的很重要，上了大學才明白，大學的好差竟然有這麼大!!!」◎號稱北美留學生第一門戶網站的「未名空間」站上也有不少關於這部影片的評論。一位名為“sherryhz”的網友說這部電影寄託了父母一代人的記憶：「以前聽爸爸媽媽說過，剛聽說恢復高考，那種激動的心情，一輩子也難以忘記。白天幹完活，晚上點起昏暗的煤油燈複習。為了買一套數理化的複習資料，可以在新華書店前排一個通宵的隊。書上的每一道題，都反覆做、反覆琢磨。1977年冬天，1978年夏天，耽誤了10年，終於，又可以讀書了。」④

非常有意思的是，這些網友的評論都印證了影片中所反映的改革開放以後的一個重要敘事——「知識就是力量」。似乎害怕觀眾不能領會，導演多次通過片中人物直接說出這個道理，其中可能算陳瓊的父親陳甫德強調得最多。這位來自上海戴着眼鏡書卷氣頗濃的知識份子在寫給女兒的信裏說：「沒有了知識，人和禽獸有甚麼差別？」更有趣的是，陳瓊在恢復高考以後考取北京大學數學系，接了父親的班，這種代代相續的父女(子)關係賦予了知識傳承更濃厚的人情味和家族意識，從而獲得了大量網友的認可。

而之前陳父的「歷史反革命」身份所造成的妻離子散，不禁讓人聯想起盧新華名噪一時的小說《傷痕》。文革所造成的家庭的破裂、親情的失落是新時期文學和電影的母題之一。如賀桂梅在《人文學的想像力：當代中國思想文化與文學問題》裏所述：「『公』／『私』領域的區隔帶有明顯的價值判斷色彩，『國』與『家』之間的對抗關係，成為了傷痕、反思文學在表達『人性』時的重要修辭。」⑤和「知識熱」一樣，新時期文學電影對人性和

家庭的歌頌肯定了現代化敘事的合理性，賦予「撥亂反正」的歷史軌迹更濃的生活氣息和人情味。

不過，細讀之下，影片似乎有意無意傳達出一些主流敘事之外的信息，其中最耐人尋味的莫過於三分場場長老遲（孫海英飾）的角色設置了。老遲這一角色非常有意思，從演員的選用就可看出這位場長並非臉譜化的反派人物，符合現在影視劇角色「人性化」的潮流。孫海英因為在2001年熱播的電視連續劇《激情燃燒的歲月》中扮演石光榮一角而家喻戶曉。老遲和石光榮有着很多相似之處，打着過去年代的烙印：來自農村，都是軍人（老遲是退伍軍人），文化水平較低，有着革命年代的理想主義精神，但是工作方式流於簡單粗暴。

影片中，老遲操一口頗具喜劇色彩的東北腔，語言生動，常帶俗語髒字兒，和知青們字正腔圓常帶點京味兒的普通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老遲對腳下的黑土地感情深厚，而對「文明社會」的生活方式和日常禮儀知之甚少，用知青潘志友的話說：「進門不敲，出門不關，就是老遲。」得知恢復高考的消息以後，老遲害怕影響農場大叻窪工程的進度，試圖阻止知青參加高考，從而造成了知青強子以絕食進行抗議，並且刻薄地批評老遲說：「你總是把組織掛在嘴上，把大印別在腰上，就是缺點人味兒。」這樣看來，似乎老遲代表的是頑固的守舊勢力，以政治權力干預個人自由，沒有人情味兒，不理解時代的鉅變，不懂得知識的重要性，以螳臂擋車之力阻擋着現代化的進程。

但是，影片並沒有把老遲這樣一個傷痕文學裏常見的反面角色妖魔化、簡單化，反而通過展現他和知青們的一系列互動來傳達出更為豐富的信息。

老遲非常喜愛和信任要扎根農場的潘志友，把他看作自己的孩子，決定把「農場的家業」交給他繼承，以高考體制之外的方式表達着對知識的尊重和對知識份子的期許。為了給潘志友和其他知青們離開農場參加高考製造障礙，老遲私自決定要先在場部舉行一輪測驗。這一做法激起了知青們的不滿，以強子帶頭和老遲進行對峙。老遲披着軍大衣，叉着腰，憤怒地揮舞着雙手，大聲質疑道：「我早就看出來了你們來了就沒把心放這兒。我們這些國家職工，復員軍人就該在這兒呆着，有知識的就不該在這兒呆着？」知青們一時無言以答，因為這句大白話的樸素質問觸及到了矛盾的關鍵。

的確，知青們參加高考的動機並非只是追求知識那麼單純，而是因為它是離鄉回城的捷徑。梁曉聲在《雪城》裏寫到有的知青為了返城不惜吞鉛塊，用筷子戳穿自己的雙耳。他這樣評論：「返城到後來對於某些知青已經不是動機，甚至也不是目的了。它簡直他媽的就演變成了一種信念，一種追求，一種理想了！」◎鄧賢的報告文學作品《中國知青夢》裏也記錄了大量當年知青回城時拋妻別子的案例①。「不回城，毋寧死！」的口號固然顯示了一代知青堅定的返城決心，卻少有人去思考為甚麼中國的廣大農村變成了一個地獄般的地方，在「希望的田野」上讓人看不到任何希望，讓人不惜付出家庭破裂、生命喪失的代價來逃離。

雖然上山下鄉已被證明了是一次失敗的試圖消除城鄉差別的社會實驗，但不可否認的是，文革期間下鄉知青和回鄉知青曾給農村帶去了文化知識和新的生活觀念。他們從事過赤腳醫生、鄉村教師、技術員等需要一定文化知識的工作，也幫助農村興修了不少交通、水利、農機等工程，為

農業的現代化和鄉鎮企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影片中多次提到的大叻窪工程就是一例。

1970年代末，知青通過高考、招工以及其他手段大規模回城，留下了很多荒廢的崗位和工程建設。《中國知青夢》也提到了知青大規模返城後當地農村農場幹部的惶惑和失落^⑩。當城市文明變成了現代化的唯一詮釋後，農村青年自己也不願意留下，成績好的上大學，成績不好的輟學進城打工，造成了農村的空心化、老齡化。當然，這裏需要批評的並非個人的選擇，真正值得關注的是經濟政治政策的調整和意識形態的轉變。

無論是「知識就是力量」，還是「知識改變命運」，這些耳熟能詳的標語口號所指的都是體制化了的知識，通過全國統一制訂使用的課本書寫的知識，囚禁在大城市裏的重點大學象牙塔裏的知識。這種體制化了的知識變成了人們改變個人命運，進入城市文明的通行證。高考的恢復不僅提供給知青一條回到城市並且向上流動的通道，並且加劇了城鄉的差距，尤其是農民和「天之驕子」的社會身份之間的巨大鴻溝。從這種角度來說，知識不僅是「力量」，而更加是「權力」，一種構建和參與文化社會精英階層的權力，這似乎也更符合“Knowledge is Power”的翻譯。

和這部電影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另一種經常被主流敘事忽略的個人對於歷史的記憶。陳雪的散文〈那年、那所大學〉記錄的是他在高考恢復前夕被推薦上大學的經歷和結局。作者這樣寫道^⑪：

1975年是全國「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運動高潮迭起的歲月，如果按後來對「十年浩劫」的界定（1966年

至1976年）也是文革最後的一年。這一年的政治背景異常複雜，由於鄧小平的復出，開始強調既抓革命又促進生產，整頓社會經濟秩序。但在教育上，張鐵生的白卷讚歌仍此起彼伏，全國學習遼寧朝陽農學院的口號方興未艾，「工農兵」學員成為特殊年代的一種時髦產物。

朝農的經驗就是開門辦學，為農村農業培養實用性的人才，更偉大的創舉是「社來社去，隊來隊去」。學員由各公社、各大隊推薦選送，到學校集中學習，掌握技術知識，又回到基層去服務。這種培訓方式作為針對當時的政治形勢和配合農業學大寨運動，無疑有着現實的政治意義。不久又推出了江西創辦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經驗，江西勞大的經驗除了具有遼寧朝農的特點以外，具有創新意義的是「半工半讀，社來社去」，打破學員年齡、學歷的各種要求和規定。也許是呼應這種時代潮流，我們的那所大學便在農校和勞大的基礎上誕生了。

陳雪沒有明言被推薦去上的大學名稱，而是用「××縣農大」代替，地址是東江河畔一個叫寶塘的地方。大學跟想像中的很不一樣，教學辦公的樓房是暫借佗城中學的，宿舍設備也很簡陋。縣農大首屆學員150人中有大隊幹部，有民辦教師，有退伍軍人和高中應屆畢業生，從300多個生產大隊選出，目的是培養農村基層幹部和農業技術員。所以，學員主要是學習農林牧水電水利等跟實際需要緊密掛鉤的課程，教材都是由經驗豐富的老師編的，到農業部門實習也是學習的重要部分。

陳雪學習的這兩年裏，國內的政局發生了重大變化，粉碎「四人幫」，文革結束，農村經濟體制進行改革，

公社編制取消，農校解散，學員們無處可去，都自尋出路去了。文章這樣結束了：「漸漸地大家忘卻了傷痛，都像人生碰到一件極為尷尬，極難啟齒的事情，把它封存起來。我至今也弄不明白兩年的學習時光怎麼就隱隱地成了我們的一絲傷痛，一個夢境，甚至是不堪回首的歲月呢？似乎誰也沒有認真去細想過。」「歷史把我們遺忘了，我們也遺忘了歷史。」^②就這樣，他們在農大獲得的和農村建設密切相關的實用性知識被重新建立起來的壟斷性的知識體制所拒斥，被歷史所遺忘；而另一方面，近年來，重點大學（中學小學乃至幼兒園）與普通高校（中學小學），經濟發達地區和「老少邊窮」地區的教育投入水平一再拉大。就在北大清華享受着國家巨額投資、力爭和牛津哈佛比肩的同時，不少報導和學者的研究都提到廣大農業地區的文盲率又有所上升。林白近作《婦女閒聊錄》裏記載湖南王榨村裏多數村民都不識字，小學畢業就算「知識份子」了，可以進城打工去了。農村再次成為了一個被知識和知識份子遺忘的角落^①。

沈潔在《讀書》發表的一篇文章討論了1901至1905年間廢除科舉和興辦新式（西式）學堂對於傳統士人階層的衝擊。作者這樣寫道^②：

時代的「進步」（如果我們暫且斷定其為進步的），將以無數人的流離失所作為代價。這種拋棄，既是指生計的、前途的，也意味着種種心境上的悵惘。……時間在前行之餘，留下了巨大的陰影。學堂時代的鄉村寒儒，他們的聲音隱沒於歷史的深處。

作為文革結束、高考恢復後出生的一代，我們雖然時常批評應試教育

的局限性，也常為韓寒這種高考體制外的「反英雄」歡呼；可是，也同時在耳濡目染、潛移默化中接受並身體力行行了高考所代表的個人奮鬥和競爭的社會精英意識。當「耕讀」傳統已經成為封閉落後的同義詞，當中國的高等教育日益產業化、城市化、精英化，當魯迅在《故鄉》和《祝福》裏反省過的知識精英和父老鄉親之間的鴻溝沒有消失，而是持續不斷地擴大時，也許，我們應該開始考慮高考所代表的「個人奮鬥」和「公平競爭」機制下被掩蓋和忽略的結構性社會不公，開始重新發掘那些被「前行」的歷史所淹沒和遺忘了的聲音。

註釋

① 羅崗：〈中國大學的自我主張——紀念高考恢復三十周年（1977-2007）〉，中國儒教網，www.chinarujiao.net/info.asp?PID=6119。

② 朱青：〈導演江海洋：《高考1977》若票房不好是社會的悲哀〉（2009年3月28日），紅網，<http://zt.rednet.cn/c/2009/03/28/1735155.htm>。

③ 參見<http://movie.douban.com/review/2002950/>。

④ 參見www.mitbbs.com/article_t/HuNan/31191483.html。

⑤ 賀桂梅：《人文學的想像力：當代中國思想文化與文學問題》（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頁51。

⑥ 梁曉聲：《雪城》，上部，《十月》，1986年第2期，頁191。

⑦⑧ 鄧賢：《中國知青夢》，《當代》，1992年5月號，頁4-117。

⑨⑩ 陳雪：〈那年、那所大學〉（2009年8月21日），陳雪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70cc7c0100ei2d.html。

⑪ 林白：《婦女閒聊錄》（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⑫ 沈潔：〈遺忘的，被遺忘的〉，《讀書》，2008年第9期，頁87。